



重塑武举： 论宋代士大夫对武将选拔制度的改革

任 晔

摘要:宋代士大夫以重塑武举为选拔理想将帅、改造武将群体、更全面深入介入军事议题的重要手段,并以文举进士科为模板,将武举取士定位为“博延方略之士,参阅材技之能”,因此,不仅在考试时加重策论分量、增试兵书大义,确立了首重程文、次及弓马的选拔标准,而且仿太学创立武学,以武经七书为主要教学内容,注重儒学的教化熏陶,同时视武举进士为“儒而谈兵者”、武学生为“士之有武勇者”,将其引为同类,为其仕宦迁转提供有力支持。宋代武举确实选拔出了一批对宋政权高度认同的军事行政人才,并在战争岁月守卫疆土、屡建功勋甚至壮烈殉国,在和平年代或担任统兵官维持一方治安,或出任边地亲民官应对各类武装挑战。同时,武举出身者与文官士大夫行政风格相近、兴趣爱好一致,在重大政治议题上也能与文官密切合作。宋代士大夫以重塑武举改造武将群体、参与军事议题的实践,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政治;武将选拔制度改革;武举;武学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5.0701

收稿日期:2024-09-11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 2023 年拔尖创新人才计划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任晔,男,山东单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bei_jingrenye@sina.cn。

作为常规选举科目的武举,始于武周长安二年(702),神龙政变后得以保留并延续至唐末,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而武举停废^①。宋代士大夫因边疆战事和改造武将群体需要,积极促成武举复置,又对相关章程、选拔标准持续调整,使宋代武举面貌与唐代迥异。自天圣八年(1030)首度开科,到咸淳十年(1274)末次取士,宋代武举开科共 71 次,偶有中辍,选拔人才数以千计^②。学界对宋代武举的研究极少,或在宋代科举通论性著作中以较少篇幅作普及性介绍^③,或围绕《宋会要辑稿》中相关条例讨论武举在制度层面的设计与规划^④,或基于宋元笔记讨论武举与社会的互动^⑤,唯有方震华颇有创见地将宋代武举置于士大夫政治背景下以政治史视角加以考察,但亦仅将其作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的注脚而着墨不多^⑥。这一既有研究现状

①王林《燕翼诒谋录》卷 5《武举更革》,诚刚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4 页。

②据龚延明、祖慧编著《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宋代武举登科者姓名可考者共 1270 人(排除登科信息存在明显错误者)。鉴于明清方志编纂存在虚构乡贤事迹之弊,本文只围绕登科信息见于宋代史料者展开研究,仍有 764 人。

③如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共 913 页,武举相关内容仅 58 页;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共 370 页,武举所占篇幅仅 17 页,甚至少于选拔人数不多、开科时间较晚的词科。

④吴九龙、王茜《宋代武学武举制度考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 36 辑,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33—247 页;周宝砚《宋代武举制度发展演变及其制度设计理念探析》,《教育与考试》2022 年第 6 期,第 26—31 页。

⑤周兴涛、杨晓宇《宋代武举武学与社会生活(上)》,《中国考试》2012 年第 2 期,第 54—64 页;周兴涛、杨晓宇《宋代武举学与社会生活(下)》,《中国考试》2012 年第 3 期,第 55—64 页。

⑥方震华《文武纠结的困境——宋代的武举与武学》,《台大历史学报》第 33 期,2004 年 6 月,第 1—42 页;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第二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5—78 页。

与宋代武举在政治运作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全宋文》(全 360 册)的整理出版^①、《宋代登科总录》(全 14 册)的汇编问世,给宋代武举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尽管二者因体量庞大而难免有粗疏之处,但瑕不掩瑜,只要复核原文、详加审订,仍可发挥其索引功能。本文通过整理宋代官修典籍、私家著作中的武举相关内容,以政治史视角观察宋代士大夫对武举的规划、设计和改革,探讨宋代重塑武举的背景、目标和手段,并且为 144 名事迹可考的武举进士制作小传(见表 2),再结合其文章著作,分析宋代武举的实际运作及其影响与成效。

一 背景:“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

唐末五代以降,文武分途格局逐渐形成,“文官的政治活动被缩限至文书与议论的范围”^②,将校之职则由具有鲜明世袭色彩的武人集团垄断^③。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和武人政治的形成,武举选拔将帅难以实行而被停废,于是,“当五代之时,诸将不起于贼盗者,必因杀夺而得之”^④。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武将擅权、王朝速亡之弊,主张“亟进儒臣以荡涤其痼疾”^⑤。宋太祖“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宋太宗“兴文教、抑武事”,明言“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⑥。在他们的有意栽培下,士大夫群体发展成为政治主导力量,故论者有“宋代为士大夫之政治”^⑦之说。君主不但倚重士大夫处理民政,还令其参与军事、镇守地方,逐渐形成“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的“祖宗之道”。但是,赵宋建国以来的边防压力,势必要求镇守一方的士大夫知晓兵事,宋太祖遂令赵普举荐“儒臣有武干者”,太宗不仅“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武)秩”,而且嘉许孙何“选儒臣统兵”之议^⑧。在君主大力提倡和客观形势需要之下,主导宋代朝堂的士大夫群体积极参与军事议题,从而形塑出以“才兼文武”的理想官员形象。

(一)对军事的关注

与强大的辽、夏、金为邻的两宋王朝,虽轻武官,却不得不重武事,士大夫喜谈兵事、亲历军戎者不乏其人。如宋沆、陈贯、沈起、萧注、张叔夜、董槐俱为文举进士而以“喜谈兵”、“喜言兵”闻名,大儒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陈亮“喜谈兵……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⑨;而在宋辽、宋夏战争中,张齐贤、王钦若、赵昌言、柳开、张咏、向敏中和郑文宝等皆以文人领兵^⑩。

然而,宋代士大夫虽积极参与军事,但甘愿换授武秩并长期供职军旅者毕竟在少数。如范仲淹与韩琦一道长期经略西北、屡建战功,却在庆历二年(1042)连上三表坚辞武职,拒不接受“观察使”的任命,以致公然违抗仁宗意旨,表示“如不获命,臣当践言,系狱上请,不敢逃罪”^⑪。又如种世衡虽自愿由文换武,长期与西夏作战,其子弟却纷纷换回文资,试图重回文官士大夫之列^⑫。且文臣改换武秩、统兵作战,全凭自愿,并无任何制度保障,无法满足宋廷选拔、任用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宋代士大夫遂试图对现有的武将群体加以改造。

(二)改造武将群体的主张

晚唐文武分途以来,文臣“不复寄以军武之任”,武将“不求以儒术之学”^⑬,文武隔膜加深,对立加剧,以

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6 页。

③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7 页。

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23 页。

⑤王夫之《宋论》,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55 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93、394、528 页。

⑦金毓黻编著《宋辽金史》,《民国丛书》第 5 编第 63 册,上海书店 1996 年影印版,第 113 页。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 8639、293、637、881 页。

⑨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85 年新 1 版,第 9646、10047、10728、10732、11140、12428、12723、12929 页。

⑩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4—25 页。

⑪范仲淹《让观察使第二表》,《范仲淹全集》第 1 册,李勇先、刘琳、王蓉贵点校,中华书局 2020 年版,第 354 页。

⑫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第 111 页。

⑬穆修《上大名陈观察书》,《全宋文》第 16 册,第 21—22 页。

致“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①。文臣被具有浓厚世袭色彩的职业武人集团排除在军队之外,武将皆拔擢于行伍之中而缺乏文化素养,名将史弘肇甚至表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②有鉴于此,出身于禁军将领的宋太祖,在开国之初,即表示“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③;太宗因曹翰为武人而能即兴赋诗,将其“自环卫骤迁数级”^④;仁宗下令汇编历代战例和军事知识为《武经总要》,分发给主要将领,并亲撰《武经总要叙》,说明此举的用意在于让武将读书、知晓兵法,“深惟帅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⑤。

鼓励现有将帅读书习文,固然有助于改变五代以来武将“大抵多务斗力……而古今成败,阴谋奇计,了莫识为何等事,直奸悍之匹夫耳”之现象^⑥,但其效果完全取决于武将的配合程度和个人资质,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士大夫主张双管齐下,以儒家理想选拔将校并著为定制,重开武举之议充盈朝野,最终促成宋代武举的设立。

二 目标:选拔“素习韬略,颇闲义训之士”

宋代士大夫对武举自有规划,其重开武举之议,并非单纯“恢复”唐代模式,而是要全面“重塑”武举,使之服务于改造武将群体的宏大目标。宋代士大夫对武举有两次集中讨论:一次是真宗即位之初,因开国将帅的凋零,希望重开武举以充实武将队伍;一次是英宗即位之初,因仁宗后期武举一度停废,将帅选拔纯由家世和军功决定,士大夫要求恢复武举以改造武将群体。在这两次大讨论中,士大夫对武举的性质与功用的认识一以贯之,即选拔崇儒尚智之将,巩固强干弱枝格局。

(一)重定武举性质,选拔士大夫理想的武将

唐代武举纯粹考校武艺^⑦,已为时人所讥^⑧,杜牧更感叹武举所取不过“壮健轻死善击刺者”^⑨。宋代士大夫对唐代武举之弊有着清醒认识。如富弼认为,“武举者,蹶张驰射,侷于卒伍,所得庸妄鄙浅”^⑩;苏洵表示,“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⑪;黄履翁痛责,“翘关、负重之选而所得皆奸悍无赖之流……守边疆、入宿卫者,不识一丁字”^⑫;等等。显然,士大夫一致主张,复开之武举绝不能是唐代武举的翻版,而是要引入程文考试,选拔知诗书、晓兵法的智将、儒将。

1. 尚智

天圣七年(1029),仁宗在士大夫的奏请下重开武举,降诏强调武举所取者为“方略智勇之士”^⑬,与唐代仅以武艺取士判然有别。对智将的推崇,早已成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共识。如真宗朝,钱若水主张“选智谋可以任边郡者”^⑭;田锡上疏请求“兴行武举”,提出“若求骑射之艺,勇猛之人,兵法中自有选求之法,便求得人,但要有智谋者指使之而已”^⑮;仁宗朝,范仲淹请求“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之边任”^⑯;高宗朝臣在回顾北宋政典时,提出“设为武举一科,或者其不止于求骑射一艺乎”,表示“今有善兵如孙

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下·刘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75页。

②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0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2页。

④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6,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页。

⑤ 赵祯《武经总要叙》,《全宋文》第46册,第19页。

⑥ 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6,明嘉靖十六年白坪刻本,第10页。

⑦ 按: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误将“言辞”一项视作“策问”,不确。李林甫认为,“言辞”一项,仅考察应举者表达能力,“有神彩,堪统领者为上,无者为次”。参见: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李林甫等《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0页。

⑧ 蒋防《兵部议》,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第7403页。

⑨ 杜牧《注〈孙子〉序》,杜牧撰、何锡光校注《樊川文集校注》卷10,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723页。

⑩ 富弼《论武举武学奏》,《全宋文》第28册,第270页。

⑪ 苏洵《上皇帝书》,《全宋文》第43册,第7页。

⑫ 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6,第9页。

⑬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500页。

⑭ 曾巩著、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9《钱若水》,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4页。

⑮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02—1003页。

⑯ 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1册,第171页。

臆,知权识变如张子房,而足不便鞍马、力不挽石弓”的智谋之将,理应是武举所选拔的人才^①。

2. 崇儒

方震华研究指出,“‘儒将’或‘儒帅’约在唐代晚期出现于文献之中,至北宋时期已成为常见的词语”^②,其主因自然是士大夫的大力提倡。孙何奏上“五议”,第一便是“参用儒将”,表示“晋、汉至唐,皆选儒臣统兵”^③;赵安仁列举儒将统兵的优势,认为“儒学之将,则洞究存亡,深知成败……况其识君臣父子之道,知忠孝弟顺之理”^④;富弼在列举郤穀等儒将后,表示“自余儒将,固亦不少焉”^⑤;仁宗力排众议拔擢刘平,给出的理由是“平,所谓诗书之将也”^⑥。

宋代士大夫既以尊崇儒学、智勇兼备为理想的武将形象,符合这一标准的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裴度等自然被推为楷模^⑦,一些本不具备上述特点的名将也以这一模式重新改写。如狄青在世时因行伍出身而备受文官攻击,最终无端贬官,忧愤而死^⑧;然而,在狄青身故后,士大夫却不断改写其生平事迹。范仲淹为狄青讲授《左传》一事被反复渲染,狄青从“晚节益喜书史”^⑨,到“自春秋、战国,至于汉以来成败之迹,概而能通”^⑩,再到“博览书史,通究古今”^⑪,其知识储备和文史素养被不断夸大,神宗朝甚至流传着狄青“识度宏远,士大夫翕然称之”^⑫的说法。其原因显而易见,即强调一切名将皆符合士大夫的理想将帅形象——“近世狄武襄最善用兵,乃于《左氏春秋》得之。是故为将而不知古今,一夫之勇耳”^⑬,乃根源所在。既然如此,武举所选之将才,也理应是通晓兵法的智将、儒将。

(二) 确保文官主导,服务“强干弱枝”目标

宋代士大夫既然将重塑武举作为选拔理想将帅、改造武将群体的重要手段,自然需要掌握武举的主导权和最终解释权,于是他们特意为武举设置了举主推荐环节,并积极参与各项制度的规划设计。

1. 增加报名推荐环节,确保文官群体参与

唐代武举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而宋代武举自复开之初即要求“未食禄人,召命官三人委保行止”,有官身者则由兵部查验资格^⑭。除淳熙初年短暂尝试“无保官者,令人状互保”^⑮之外,其余70榜武举皆命官保举。

自英宗至孝宗朝,武举举主范围逐渐扩大,最终文官自升朝官^⑯以上均取得保举资格。各级武官虽有权保奏武举人,却对此态度消极甚至公然抵触(详见后文)。因此,武举人的资格审查由文官群体主导,应武举者基本都符合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立场偏好,在入仕后与文官互动更为频繁且融洽。宋代武举举主群体身份及奏举人数简况统计见表1。

① 章如愚辑《群书考索》后集卷29,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608页。

② 方震华《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后期士人的军事参与》,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附录,第230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8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77—978页。

⑤ 富弼《论武举武学奏》,《全宋文》第28册,第271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八月,第2692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庆历三年八月,第3424页。

⑧ 陈峰、张明《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中州学刊》2000年第4期,第144—148页。

⑨ 余靖《宋故狄令公墓铭》,《全宋文》第27册,第118页。

⑩ 王珪《狄武襄公神道碑铭》,《全宋文》第53册,第203页。

⑪ 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2,吕友仁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⑫ 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2,第16页。

⑬ 袁燮《武学登科题名记》,《全宋文》第281册,第248页。

⑭ 《宋会要辑稿》,刘琳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586页。

⑮ 《宋会要辑稿》,第5605页。

⑯ 唐代自一品官以下常参朝班之官,统称“京官”,不常参朝班者称“未常朝官”。入宋,常参朝官人称“朝官”,或称“升朝官”。文官本官阶升朝官,指“太子中允、赞善大夫、洗马、中舍”阶以上至太师阶。神宗元丰五年改制,即以“文臣寄禄官通直郎(正八品)以上至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为升朝官”;徽宗政和二年九月,改武选官名后,定以“修武郎(正八品,旧为内殿崇班阶)以上至太尉(正一品)为升朝官”。参见: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2版,第736页。

表 1 宋代武举举主群体身份及奏举人数简况统计表

时间	举主群体	资料来源
治平元年 (1064)九月	在京管军及正任横行使副使、知杂及三院御史、谏官、府界提点、朝臣、使臣； 在外安抚、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三路知军州及路分总管、钤辖，各奏举一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2， 第 4902—4903 页
元丰元年 (1078)二月	文臣在京监察御史里行、在外诸路提点刑狱、府界提点以上，武臣在京閤门副 使，在外路分钤辖以上，各举堪应武举一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88， 第 7051 页
元丰三年 (1080)八月	两制、台谏至总管、监司，各举堪应武举进士一人以名闻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07， 第 7455 页
元祐七年 (1092)八月	寺、监长贰，各许奏举武举一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76， 第 11343 页
淳熙五年 (1178)八月	文臣升朝官、武臣正使以上各保奏二人	《宋会要辑稿·武举》，第 5607 页

2. 限定兵书流传范围，网罗各地军事人才

宋代在“崇文抑武”和“守内虚外”的方针下，始终严格管控兵书战策的流传、刊印和讲习，甚至一度禁止兵书的传播；然而，现实的国防需求，却使宋人对兵书战史的现实需求相当迫切。故同知枢密院事韩亿建言：“武臣宜知兵书，而禁不传，请纂其要以赐之”，仁宗允准后，差人“作《神武秘略》，凡三十篇，分十卷，仍自作序焉”^①。

武举之设，恰好在宋代严禁兵书和亟需兵书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即将兵书流传限定在应武举者这一可控群体之中。武举设立之初，政策未及调整，一度出现“陛下设制科武举求将帅之才，而反禁其所习之书，令学者何所师法”^②的尴尬局面。富弼因而奏请开办武学，“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③。武学短暂停废时，又允许国子监学生中，“有好习兵书者，令本监官员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听读”^④。

武举之设，又起到网罗各地军事人才的重要作用。科举自初创之时即具有牢笼志士的功用。唐太宗见新科进士出入贡院，喜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⑤宋代士大夫奏请重开武举时，明确提出“宜复唐之武举，则英雄之辈愿在彀中”^⑥，“四海九州必有壮士，宜设武举，以收其遗”^⑦，希望借此将“四方之奇材武力悉聚京师，则本强末弱，可以消匹夫山林之变”^⑧。宋代扩大文举录取规模，又设武举，“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英雄豪杰皆汨没消磨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⑨。因此，建炎南渡不久，何侗奏称，若不兴科举、办官学，“则士之不知爱重者不入于敌，则入于盗矣”^⑩。

三 手段：“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

宋代士大夫在奏请重开武举之初，就同时提出重塑武举和创办武学两项议题。唐代武举只考察武艺，又无兵书之禁，没有设置武学的需求。宋代重塑武举，特重考察兵学知识，又因严禁兵书，需将兵书传授限制在特定范围内。于是，富弼提出创办武学以满足新式武举的需要，“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⑪，此议不久后即付诸实施。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0，景祐四年六月，第 2833 页。

② 富弼《论武举武学奏》，《全宋文》第 28 册，第 271 页。

③ 富弼《论武举武学奏》，《全宋文》第 28 册，第 271 页。

④ 范仲淹《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令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范仲淹全集》第 2 册，第 487 页。

⑤ 王定保撰、陶绍清校证《唐摭言校证》卷 1《述进士上篇》，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9 页。

⑥ 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 1 册，第 171 页。

⑦ 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 1 册，第 190 页。

⑧ 朱松《论时事札子九》，《全宋文》第 188 册，第 265 页。

⑨ 王林《燕翼诒谋录》卷 1《进士特奏》，第 1—2 页。

⑩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1988 年版，卷 148，绍兴十三年二月，第 2381 页。

⑪ 富弼《论武举武学奏》，《全宋文》第 28 册，第 271 页。

(一)重订武举章程,对标文举改革

宋代重开武举之初,即强调所取者当为“方略智勇之士”^①,殿试策问表示“博延方略之士,参阅材技之能”^②,首重军事方略、次及武艺勇力的标准显而易见。苏舜钦仍不满意,甚至建议“武举者去骑射之末,而访以机略之大”^③。为选拔方略智勇之士,宋人不仅简化武举的武艺考查项目,而且仿照文举进士科程式,先后引入策论、大义两项考试科目,并且确立首重程文、次及弓马的选拔标准。

1. 引入策论考试

天圣七年重开武举诏中,明确提出武举将设策论环节,并将能作策论定为资格审查的必要条件,规定有官身者“先录所业军机策论伍首上本部”,白身人则“附递文卷上兵部,委主判官看详”;次年,武举首榜,确立先试策论,“词理稍堪,人材有行止者,牌送马军司引试”的程序^④。

策论最初只试一道,北宋熙宁八年(1075),重申武举章程时,明确“时务边防策一道,限七百字以上成”;到绍圣四年(1097),翰林学士林希等奏请“应武举人止试策一道,太略,欲乞依进士试三道”,哲宗对此有保留地接受,降诏“自今发解省试添试策一道”,将策论增至两道^⑤。到南宋前期,仍试“兵机策二道”^⑥,后期则试“策三道”^⑦。策论在武举中的分量逐步提高,考查难度也相应增大。

2. 增加大义考试

宋代士大夫认为,“将之有兵法,犹儒之有《六经》也”^⑧。这就是说,既然应文举者须读儒家经典、试儒经大义,那么应武举者自当读兵家经典、试兵书大义。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三班院言殿直雷珣“乞试《六韬》、《孙》、《吴》兵书义十道,仍试骑射,中选”,使士大夫深受启发;熙宁五年(1072)九月,从御史刘孝孙请求,“诏武学生试大义十道,分两场”,“后试武举人亦如之”^⑨。之后不久,礼部又以“《六韬》本非完书,辞理讹舛,无所考据”为由,奏请仅从《孙》、《吴》出义题而获准^⑩。元丰三年(1080),神宗降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⑪,合称《武经七书》,既用作武学教材,也成为武举大义考试的选题范围。

武经大义的考查难度极低,最初只是枢密院为降低武举程文考试难度,令“不能答策者止答兵书墨义”而奏请设置;在遭王安石否决后,由试策的替代者“墨义”调整为试策的补充者“大义”,十道之内“第一等取四通,第二等取三通,第三等取二通,并为中格”^⑫。武举增设大义考试,是王安石科举改革的一部分,呼应文举进士科“罢诗赋、贴经、墨义”而“试以大义”的改制^⑬,形式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因其考试难度过低,以致无法起到筛选作用,在排定武举考生等第名次时,仍以“策义”和“武艺”两项为衡量标准^⑭。

3. 首重程文、次及弓马的选拔标准

宋代士大夫不但逐步加重武举程文考试的分量,而且在排定考生等第时,始终遵循首重程文、次及弓马的标准。治平元年(1064),英宗采纳翰林学士王珪建议,确立“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原则,且策略权重高于弓马,“以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策优艺平者为次优,艺优策平者为次等,策、艺俱平者为末等”,并且规定试策合格者,即使弓马不中,也可获准补考,甚至武艺实在不精、补考仍不合格者也不影响登科,只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500页。

②胡宿《御试武举策题》,《全宋文》第22册,第18页。

③苏舜钦《投匭疏》,《全宋文》第41册,第15页。

④《宋会要辑稿》,第5586、5587页。

⑤《宋会要辑稿》,第5593、5595页。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武举》,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5页。

⑦赵升编《朝野类要》卷2《三场》,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1页。

⑧《李觏集》卷17《强兵策第十》,王国轩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第2版,第165页。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303、5799页。

⑩《宋会要辑稿》,第5593页。

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375页。

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690、8385页。

⑬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18页。

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959页。

需要降等授官,如“李岩夫试策中第一等,弓马不中,再试,中第二等弓马……诏与茶酒班殿侍、郾延路指挥使”;绍兴五年(1135)八月武举,“(试策)平等四人,第一、第四人与承节郎,第二、第三人武艺不合格,与进武校尉”^①。因此,武举进士马扩出使金国时,粘罕问:“闻教谕兵书及第,莫煞会弓马否?”马扩答曰:“武举进士,取在义策,弓矢特其挟色耳。”^②

实际上,宋代武举的武艺考试难度本已极低,相比唐代,既减少了考查项目,废除“长枪、翘关负重、射札之科”,又降低了合格标准,“但取箭满,不问中否”^③,因“箭与弓把齐为满”^④,所考查者并非射箭的精度,只是武举人的臂力。即便如此容易的武艺考查,也有不少武举进士需补考,甚至补考不过,反映出许多应武举者并非习武之人,而是熟读兵书、善于撰文的读书人,以致北宋“进士两处投下文字,失解后旋看兵法,权习弓兵,意务苟进”^⑤,南宋则“太学诸生久不第者,多去从武举”^⑥的现象始终存在。宋廷非但不强化武艺校试,反倒一再降低要求,即步射在一石一斗力、一石力弓外增加九斗力弓,而马射废八斗力弓,仅使用七斗力弓^⑦,最终形成“弓马近于具文,所取不过解作《七书》义者”^⑧的武举格局。其用意甚明,即借助武举将士大夫认可的熟读兵书、通晓文史者选入武将队伍,不在武艺优劣上多作计较,以实现其改造武将群体的长期规划。

(二)开办武学,为武举培养人才

宋人开办武学,以配合武举改革。最初的设想是为武举中第者入学深造,“应试武举合格者方许入学,给常膳,习诸家兵法”^⑨。如武学上舍生员曹安国,“未建学已应武举,两试秘阁中选”^⑩。然而,武举中第者本已取得授官资格,完全可以直接入仕。况且,武学学制极长,“在学及三年,则具艺业保明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士人遂对入武学深造兴趣索然,武学员额因此有极大缺口,于是被迫在两月后作出调整,凡取得武举应考资格者,“遇生员阙,愿入学者听,仍免试”,三班使臣与白身人也有参加入学考试的资格^⑪。此后,武学正式成为武举的人才培养机构,真正实现了富弼“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⑫的规划。

1. 仿照太学模式,完善武学制度

宋代士大夫将武学视作太学翻版,仿照太学模式,逐渐完善武学的规章制度。庆历三年(1043)五月,北宋朝廷依太学庙学结合之例,首度“置武学于武成王庙”,然而未及开展教学,当年八月戊午即“罢武学”;熙宁五年复置,仍循“武成王庙置武学”之例;元祐元年(1086),礼部奏请“太学、武学条,乞一处相照修立,贵不致抵牾”^⑬而获准。此后,士大夫不断援引太学章程改革武学制度。其一,参照皇帝亲视太学例,确立视武学仪典^⑭;其二,参照太学“内舍校定”之法,定“武学上舍试,取放优等一名”之制^⑮;其三,依太学国子例,立武学“国子员额”,收补武臣“亲属教育”^⑯;其四,“学规依太学例试补,月考课升名”,“宗、武学,俱有学廩膳供舍选释褐,一如太学例”^⑰。

不但中央武学仿照太学模式建立,崇宁三年(1104)之后设立的州县武学,也仿照地方官学订立制度。两

①《宋会要辑稿》,第5589、5590、5598页。

②马扩《茆斋自叙》,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③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7《议武举条贯》,王同策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5页。

④杜佑《通典》卷149《兵典二》,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16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367页。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选举考七·武举》,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01页。

⑦《宋会要辑稿》,第5607页。

⑧《刘克庄集笺校》卷81《欧阳经世进(中兴兵要)申省状》,辛更儒笺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12页。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689页。

⑩《宋会要辑稿》,第2804页。

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689、5729页。

⑫富弼《论武举武学奏》,《全宋文》第28册,第271页。

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378、3423、5689、9060页。

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1150页。

⑮《宋会要辑稿》,第2810页。

⑯《宋会要辑稿》,第2811页。

⑰吴自牧《梦粱录》卷15《学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2页。

宋有记载的地方武学斋舍 30 余所,其中有 9 处以“德”为斋舍名(如以“辅德”、“果德”、“昭德”等为名),7 处以“文”为斋舍名(如以“辅文”、“炳文”、“备文”等为名)^①,同样体现出鲜明的士大夫价值取向。

2. 慎选武学学官,严明教学纪律

自武学建立之初,其学官选任就采用太学“中外学官并试补”之例,如蔡硕“试治边策,词理稍优”而担任武学教授,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候一年召试”,元城县主簿吴璋“候武学教授有阙,试兵机、时务策各一道取裁”;元祐更化,罢学官试补之制,“一用应诏荐举之士为中外学官”,特别强调“武学学官,亦乞依此罢试用举”^②。武学学官待遇也逐渐向太学博士看齐。如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五日,“诏武学博士自今中书省选差”;政和三年(1113)三月五日,重申“武学博士依太学博士法,朝廷差人”之制;淳熙五年(1178),武学谕,“依太学正、录在职一年,通历任五考,改合入官”,同时“武学博士改官,依太学博士条施行”^③。

士大夫期待武学能为其培养理想将校,进而改造武将群体,对其教学质量相当关注。武学博士蔡硕虽贵为宰相胞弟,仍因“博士职专教导,而硕一月之间诣学者不过七八”而遭到弹劾^④;判武学程颢名高一时,却因政敌何正臣攻击其“学术迂阔,趋向僻异”而去职^⑤。在朝臣关注和监督下,武学学官对教学自然用心,因此武学博士魏了翁与学生孙从之在阔别二十年后重聚,尚能相认^⑥。

值得注意的是,弓马武艺并非武学的教学内容。士大夫关注的是在武学中渗透儒家思想。如程颐奏请在武学课程中“添入《孝经》、《论语》、《孟子》、《左氏传》言兵事”^⑦。许多太学学官执教武学,“尔以文行,简在东胶,誉处盛矣。推所讲明,施及右学,将见诸生不但习《孙》、《吴》而已”^⑧。而武学生若想习武,则“听赴教习马军所学马步射”^⑨。因此,徽宗设立州县武学时,特别强调“教谕听与武士就学,质问《七书》兵法,即不令指教武士弓马事艺”^⑩。

(三)培养武举进士、武学生的士人认同

宋代自仁宗重开武举即视武举人为“方略智勇之士”^⑪,孝宗更明确表示“子大夫儒而谈兵者也”^⑫。武举进士、武学生既属士大夫中“晓习兵策”者^⑬,登科恩例和权利待遇自然比照文举进士和太学生,并在与职业军人的较量中屡屡得到士大夫群体的支持。

1. 武举进士登科恩例比照文举进士

武举登科者称“武举进士”,始于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罢明经、诸科”,仅以进士一科取士的改革^⑭。熙宁六年(1073),神宗“御崇政殿试武举进士”,“武举进士”首见于宋代史书;熙宁八年(1075),别试所言,“武举进士宋昇等六人弓弩绝伦”,是“武举进士”首次出现在官方公文的记载^⑮。乾道五年(1169),孝宗“垂意武科,以授官与文士不类”,下令武举进士“依文举给黄牒”,“又以文举状元代还,例除馆职,亦召武举榜首为阁门舍人”^⑯;乾道八年(1172),又仿文举进士恩例,“于武举敕牒前衔作‘武举正奏名某’……拟第一名赐‘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并所补官”^⑰。

①周兴涛《宋代地方武学初论》,《教育与考试》2010年第5期,第35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298、5817、6459、7030、9298页。

③《宋会要辑稿》,第2812、2811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8056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208页。

⑥魏了翁《渠阳集》卷17《孙武义墓志铭》,张京华校点,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62页。

⑦程颐《三学看详文》,程颢、程颐《二程集·文集》卷7,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563页。

⑧陈傅良《太学正孙元卿除武学博士制》,《全宋文》第267册,第170页。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367页。

⑩《宋会要辑稿》,第5596页。

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500页。

⑫赵昀《试武举进士制策》,《全宋文》第234册,第375页。

⑬胡宿《御试武举策题》,《全宋文》第22册,第18页。

⑭《宋会要辑稿》,第5531页。

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011、6561页。

⑯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选举考七·武举》,第1000页。

⑰《宋会要辑稿》,第5603页。

武举、文举中第者既然同为进士,则朝廷赐予的各项登科恩例与庆典活动,皆比照文举而设,有御赐袍靴笏带、官方操办闻喜宴、武学造《武举登科题名记》石碑、地方官府为武状元立坊、各地贡士庄助学、府学赠送、鹿鸣宴席,凡文举所有,武举应有尽有。只是其規制稍有区别,如依文官着绿、武官金紫之例,文举进士“赐绿袍”,而武举进士“赐紫罗袍”;其规格略有降低,如建康府学赠送之例,“赠送乡举发解各五十千”,而“武举发解各二十千”^①。

2. 武学生权利待遇比照太学生

武学生被士大夫视作“士之有武勇者”^②,权利待遇比照太学生。其一,物资发放,“武学补中生员,依太学生例给绫纸赞词”^③;其二,舍选释褐,“武士上等,欲依文士上等已降指挥施行。从之”^④;其三,舍选授官,武学上舍生释褐而不愿从军者,“候一任回,与升一等差遣……窃缘太学上舍登第,例与省试上十名并注教官,而武举上舍不应全无忧恩”^⑤;其四,特殊优待,“两学士人,因事到官,合行理对,或因干连,合行追证,并申国子监,俟回报方得施行”^⑥。

太学生视武学生为同类和伙伴,二者之间的互动合作融洽且密切。嘉定三年(1210),临安府尹赵师霁擅自鞭挞逐馆客武学生柯子冲、卢得宣(又写作“卢德宣”、“卢宣德”),武学生周源等发动罢课并呈上诉状,太学生宣缙等立即罢课响应且联名抗诉^⑦,最终因“文武二学之士交投牒,师霁乃罢免”^⑧。淳祐十二年(1252)六月,武学生列札为同舍贫寒学子求棺木时,遭临安府官吏侮辱,“斋众同太学、宗学伏阙上书,不报,各卷堂散去”,并集体赴宰执官邸控诉^⑨。此外,在嘉定十二年(1219)弹劾工部尚书胡榘^⑩、嘉熙元年(1237)为济王赵竑伸冤^⑪、淳祐四年(1244)抗议宰相史嵩之夺情^⑫、景定五年(1264)借彗星批评时政^⑬这四场重大政治运动中,太学生与武学生同进同退、相互声援,均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3. 士大夫对武举进士、武学生的提携关怀

武学生的每次运动都能实现预期目标,离不开士大夫群体的有力支持。如武学、太学生控告赵师霁事件中,国子监司业陈武以下各学官均联名上奏,声言因学生受辱,“武等忝为学官,难以在职,乞行罢黜”^⑭,迫使宁宗放弃袒护赵师霁;武学、太学生抗议史嵩之夺情运动中,国子监祭酒徐元杰向理宗力陈:“正论乃国家元气,今正论犹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⑮,最终迫使史嵩之去职。

士大夫通过武举选拔熟读兵书、谙习文史的新式将校进入军事系统,有利于消解将家子弟对武职的垄断和对军队的把控^⑯。职业武人集团对此有清醒认识,自然抵触保举武举人,排挤进入军事系统的武举进士,其突出表现有三点。第一,阻塞升迁渠道。绍熙四年(1193),殿前司奏请,“将武举将官自今后年限已及、能弓马、管事廉勤之人,照年限次第升差至正将止”^⑰。第二,拒绝保奏升迁,以致士大夫向孝宗抗议:“武举从军人职事勤恪,即从主帅具名保奏升差,累年未见引用是条升差一人,岂其果不堪用者乎?”^⑱第三,直接排挤

①周兴涛、杨晓宇《宋代武举武学与社会生活(上)》,《中国考试》2012年第2期,第54—64页。

②袁燮《武学登科题名记》,《全宋文》第281册,第248页。

③《宋会要辑稿》,第2807页。

④《宋会要辑稿》,第2805页。

⑤《宋会要辑稿》,第5609页。

⑥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吹剑四录》,张宗祥校订,《丛书集成初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0页。

⑦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吹剑四录》,第110页。

⑧脱脱等《宋史》卷247《宗室传·师霁传》,第8749页。

⑨俞文豹《清夜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页。

⑩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吹剑四录》,第110页。

⑪周密《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张茂鹏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2页。

⑫脱脱等《宋史》卷414《史嵩之传》,第12425—12426页。

⑬周密《齐东野语》卷17《景定彗星》,第319页。

⑭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吹剑四录》,第110页。

⑮徐子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02页。

⑯彭雪燕等《宋代“将门”现象与武举制度相互拱卫的历史效应分析》,《武术研究》2022年第3期,第12—15页。

⑰《宋会要辑稿》,第5610页。

⑱《宋会要辑稿》,第5609页。

侮辱,以致许多武举进士“不堪笞捶之辱”而不从军^①。

面对职业武人对武举进士的打击排抑,士大夫予以及时有力的回应,其表现如下:第一,绍熙五年(1194)联名奏请允许武举进士“升差统领、统制官”,嘉定十年(1217)又要求“自偏裨制领而上,主帅三衙,由此其选”,皆获准^②;第二,乞诏枢臣明立“兵将官升差格法”,保障武举进士迁转顺畅^③;第三,淳熙八年(1181)令将帅不得擅自处罚武举从军人,“遇有过犯,合加罪责,申枢密院取旨。盖不尽用阶级之制,且使无捶楚之辱”^④。

此外,士大夫又为武举进士争取到许多政治权利。一方面,使其免于担任负责官营经济和征税管库的监当官。武举进士授官皆入武选官序列,如“按制度,武选官初任,必须经历监当官,通过与统兵风马牛不相及的监当官积累资历,然后才可能进入统兵官的行列”^⑤,然而若由武举入仕,则可“免监当与缘边差遣”^⑥。南宋初,何溥上奏,“乞将武举一科,参照祖宗典故,修立入官资格,历从戎事,免使监当”^⑦,希望使武举进士尽快参与统兵,改变武将群体的人员构成。另一方面,许多岗位优先选注武举进士。如《元丰选官格》规定,“选巡检捕盗之官,则以武举策义武学生”^⑧;淳熙四年(1177)诏令,“自今武学博士、武学谕,并于武举出身人内选差”^⑨;诸暨等要县县尉也专门“差武举出身人”,理由是“尉既用士人,纵有不职,必不至如右班之甚”^⑩。

四 成效：“岂得谓之无益于世者”

因为两宋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因此担负选育才功能的武举和武学始终备受世人质疑,如“靖康之变,不闻武学有御侮者”^⑪;“自淳熙以来,武举人亦未有卓然可称者”^⑫;“所得士尚皆齷齪,亡古名将风”^⑬等。然而,武举是武将选拔的显途,却不是主干道。以嘉定六年(1213)为例,尚书右选“武举七十七员”,而“军班并拣汰军功人一千二百八十五员”;侍郎右选“武举四百一十五员”,而“军班七百五十九员,军功八百四十七员”^⑭。由此可知,出身武举者仅为军功补官者的1/6。因此,让武举承担宋代积弱的责任,显然有些过分苛刻。宋理宗称赞武举,“本朝以文取士,我武维扬,能使西贼胆寒者,实自科举出也”^⑮。此言固属夸张,但亦透露出一些实情。靖康之难,朝廷“募敢死士,得武学生蔡仔等四人”^⑯,突出汴梁请求援军,武学生挺身御侮者更不乏其人。学人周兴涛通过对“宋代见于文献记载的有一定军事作为的武举、武学生仅36人”的梳理指出,武举进士、武学生虽少有军功显赫者,但都坚定支持宋政权,“在抵御外侮、平定叛乱时,他们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有骄人的战绩”^⑰,此言可谓允当。笔者进一步整理出144名武举进士生平资料(参见表2),再结合武举进士的言论著作,力图对宋代武举的成功与争议之处作出更加客观的评价。

①王林《燕翼诒谋录》卷5《武举更革》,第44—45页。

②《宋会要辑稿》,第5610、5614页。

③《宋会要辑稿》,第5609页。

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5《淳熙武举授官新格》,第779页。

⑤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第10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978页。

⑦《宋会要辑稿》,第5600页。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7907页。

⑨《宋会要辑稿》,第2811页。

⑩杜范《便民五事奏札》,《全宋文》第320册,第150页。

⑪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32,第1063页。

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5《淳熙武举授官新格》,第780页。

⑬王洋《策问》,《全宋文》第177册,第190页。

⑭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嘉定四选总数》,第757—758页。

⑮潜说友纂《咸淳(临安志)》卷12,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⑯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许沛藻等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07页。

⑰周兴涛《宋代“不武”不能独罪武举、武学制度》,《孙子研究》2015年第4期,第104、108页。

表2 宋代武举进士仕宦情况统计表

所任最高官职		姓名	资料来源
类别	职官/差遣		
宰执	参知政事	朱熠	《宋史》卷357、卷408、卷453、卷454、卷456;《(淳熙)三山志》卷28至32;《(咸淳)临安志》卷61;《(嘉定)赤城志》卷34;《(嘉泰)吴兴志》卷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祝穆《宋本方輿胜览》卷13、卷43;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4、卷17;李俊甫《莆阳比事》卷1;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卷13、卷19;楼钥《攻愧集》卷29、卷34、卷102;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17;陈傅良《太学正孙元卿除武学博士制》,《全宋文》卷6024;宗泽《宗忠简集》卷3;程俱《北山集》卷34;范浚《香溪集》卷21;孙应时《琴川志》卷8;王之道《相山集》卷29;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9;刘克庄《刘克庄集》卷81;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80;魏了翁《渠阳集》卷17;刘宰《漫塘集》卷30;吴泳《鹤林集》卷8;马扩《茆斋自叙》;熊克《中兴小纪》卷37;李昉英《文溪集》卷5;吴潜《履斋遗集》卷3;袁甫《蒙斋集》卷9;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周密《齐东野语》卷12;《宋会要辑稿》之《选举》、《崇儒》;《宋仙居进士题名碑》及《续题名碑》;郑岳《莆阳文献传》卷43;应廷育《金华先民传》卷6;黄仲昭《八闽通志》卷50至卷55;《(弘治)温州府志》卷13;《(嘉靖)福宁州志》卷8、卷11;《(嘉靖)宁国府志》卷8;郑柏《金华贤达传》卷6;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96;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45;《(雍正)浙江通志》卷129
牧伯	州观察使	蒋介	
	州防御使	周虎	
	州团练使	徐量	
	州刺史	蔡必胜	
京朝官	吏部侍郎	应节严(试换文资)	
	吏部郎中	高梦月(试换文资)	
	太府卿	王卿月(试换文资)	
	武学博士	赵应熊、蔡镐、叶嵩、黄哀然、王宿	
	武学谕	柯熙	
统兵官	武学教授	文焕	
	路马步军总管	马扩	
	步军都虞候	何灌	
	正、副将	薛奕、黄困、缪德绶、柯梦弼、黄宋祥、刘德成、林之望	
	御前某军第某将	王士言、江伯夔	
	府兵马司统领	余士武	
	路兵马都监	蒋师坚、林嵩、金性、王奇	
	路兵马钤辖	徐森木	
亲民官	都巡检	陈昕、丁执中	
	巡检	邢舜举、陈师良、徐泳、阮瑀、李国辅、林概、郑恭、林汉辅、郑容、郑容	
	安抚司准备将领	施梦枢、陈英准、叶芬	
	知府	林景衡、焦焕炎、章梦飞、程鸣凤	
	知州	马识远、汤莺、薛伟、缪梦达、高选、吴沆、黄裳、王智夫、杨斌、李兴时、姚廊、陈纪、林伯成、厉仲祥、林泰定、周用亨、程元鼎、陈良彪、李亮、陈万春、叶灏、缪震、孙应龙、郑嗣之、周师锐、林汝决、王霆、陈孝严、柯梦旂、杜幼节、陈梦雷、黄超叔、陈霆发、林梦新、刘必成、项桂发、朱应举、褚生	
	州通判	江伯虎(试换文资)、侯畱	
	知军	徐徽言、王公弼、黄章、陈云、姜必大、赵时赏	
幕职	知县	金驹、姚况、林仲虎、黄度、王孙贵、朱仲弼、林以礼、缪元龙、孙巨源、陈公烈、高处仁、张万、刘应沐、刘渊泉、林应龙	
	知寨	郑觉	
其他	县尉	陈万、陈昭德、陈谋、黄钺、黄纯仁、张伯威、郑缙、胡谦、范祖筠、刘忠嗣、陈宗阳	
	诸州、司计议官	鲍惟几、黄梦攸、王元宝、黄宋英、陈湜、陈起渊、梅应奇	
	诸州、司参议官	黄昌辰	
	路提举常平使	王三锡	
	路提点刑狱公事	许亢	
	监税	鲍惟时、陈大节	
	专任閤门舍人	林尧臣、林曠、陈子衡、郑子衢、黄南叔	
	诸司干办官	郑抟、赵万年	
州学教授	杨文焕		

备注:官职分类及定名,参考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

(一)成功之处

章如愚认为宋人对武举、武学的批评过分偏激,表示“今朝廷所问,稍有声称者,皆由武举而得,此其所取,岂得谓之无益于世者”^①。揆诸事实,武举进士建功立业者不少,慷慨殉国者亦有之。如武状元薛奕,在元丰五年永乐城之役中,与西夏军力战殉国^②;徐量,常年在鄜延路与西夏、西羌作战,善用兵法,屡建奇功^③;王士言,参与讨平方腊,靖康元年坚守泽州,与金军巷战殉国^④;徐徽言,与西夏作战屡立战功,靖康年间领兵取河西三州,又“与金人麇河上,大小数十战,所俘杀过当”,坚守晋宁数年后殉国^⑤。此外,叶颙^⑥、何灌^⑦等守卫汴梁殉国,姚望之^⑧、侯畱^⑨、赵时赏^⑩、刘伯文^⑪等与蒙军作战殉国。上述将帅战功固然不如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但忠心报国且不乏战绩,不应予以忽视。战争岁月,武举进士守卫疆土、屡建功勋;和平年代,武举进士作为统兵、治安或亲民官,同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 确实选拔出了一批合格的军事、行政人员

武举入仕者的仕宦经历,与普通武选官相似,只是往往免于监当而直接担任统兵官,且有权担任武学学官,升迁也更快。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在入仕诸途中,“纳粟、胥吏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武举”^⑫,武举出身者比其他武职人员更具行政能力,因此往往被差注知府、知州等重要职位,进入亲民官系统。

武举进士进入统兵官系统,有助于改变武将群体的人员构成,符合士大夫的期待;进入亲民官系统,则往往派往边境州县,发挥其兵学知识和军事才干。如作为宋金前线重镇的光州,往往选派武举进士,蔡必胜、周虎、王霆、陈孝严都曾知光州。金军入侵浮光时,宋廷虑文官知州无力应对,“朝论以为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边都巡检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驰至州,分遣间探,整饬战守之具,大战于谢令桥,光人遂安”^⑬;开禧北伐前,鉴于文官知州“边郡犹狃和好,城壁不葺”,命周虎知光州,整训军队,加固城防^⑭。武举进士的行政能力和军事才干,在边境州县得以充分展现。

2. 成功塑造武举进士、武学生的士人认同

宋代士大夫将武举进士和武学生视作同类,希望这批“儒而谈兵者”^⑮进入军事系统后,能够使士大夫对军事议题的参与更全面更深入。武举进士和武学生也的确认自己的士人身份,以致朝论认为“武举从军之人,往往自高,不亲戎旅”^⑯。如蔡必胜赴江东军营时,不遵“将官谒帅,皆小袖衫拜庭下”之例,而是“袍笏肃揖,帅因请以宾礼见”^⑰。

武举出身者行政风格与文官士大夫相近。如蔡必胜知楚州,“亲至学宫,课率诸生,劝教有义,士人兴起”^⑱;王霆知蕲州,“建学舍,祠忠臣”,尝训其子弟曰:“穷理尽性,学之本也。”^⑲不仅如此,武举出身者的兴

①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29,第609页。

② 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輿胜览》卷13,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2页。

③ 程俱《故武功大夫昭州团练使骁骑尉徐公行状》,《全宋文》第155册,第371—375页。

④ 脱脱等《宋史》卷453《忠义·王士言传》,第13321页。

⑤ 脱脱等《宋史》卷447《忠义·徐徽言传》,第13190—13193页。

⑥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119《宋故尚书左仆射赠少保叶公行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32页。

⑦ 脱脱等《宋史》卷357《何灌传》,第11227页。

⑧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修订本)》卷72《人物志·姚望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031页。

⑨ 脱脱等《宋史》卷454《忠义·侯畱传》,第13346页。

⑩ 邓光荐《文丞相督抚忠义传》,《文天祥全集》卷19附录,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版,第505页。

⑪ 邓光荐《文丞相督抚忠义传》,《文天祥全集》卷19附录,第509页。

⑫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402页。

⑬ 脱脱等《宋史》卷408《王霆传》,第12314页。

⑭ 刘宰《故马帅周防御圜志》,《全宋文》第300册,第324页。

⑮ 赵脊《试武举进士制策》,《全宋文》第234册,第375页。

⑯ 《宋会要辑稿》,第5608页。

⑰ 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7《蔡知閤墓志铭》,刘公纯等点校,中华书局2010年第2版,第317页。

⑱ 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7《蔡知閤墓志铭》,第319页。

⑲ 脱脱等《宋史》卷408《王霆传》,第12315页。

趣爱好,也与文官士大夫一致。如陈师良“平生好作诗,晚年诗益工,每一篇出,识者服其笔力”^①;徐泳擅长文学,“其诗词,视唐诸子矻矻弄篇章者多哉”^②;单炜“得二王笔法,字画遒劲,合古法度,于考订法书尤精……名士大夫多与之交,自号定斋居士”^③;周虎“文词敏赡……作大字端劲,独步当世”^④。“武学在太学之侧”^⑤,武学生与太学生互动频繁,往来密切,士人习气更重。如徐量以武学生应武举入仕,久任边地知州,“尊礼学官弟子,其劝驾士具宴礼,则遣骑导,作乐迎送”,并表示“边夷不知儒重,非痛折节以竦动之不革”,在其治下,“诣学官求试者倍常”^⑥。

3. 带动一些武将、军士研读兵书

武举进士、武学生释褐加入武将群体后,带动了一些将校军士研读兵书、讲谈兵法。熙宁三年,“三班院言殿直雷珣乞试《六韬》、《孙》、《吴》兵书义十道,仍试骑射”,考试合格后受神宗嘉奖^⑦;淳祐十年(1250),“武举正奏名王时发已系从军之人,充殿前司左军统领”,其登第后,理宗“特命就本职上与带‘同’字,以示优厚劝奖”^⑧。武举、武学的示范作用及其对武人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 争议之处

宋代武举固然选拔出一批符合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合格军事行政人才,但没有一项选官制度是绝对完美的,其饱受非议之处主要集中在武举科场舞弊及部分投机者以武举为入仕捷径两个方面。

1. 武举科场舞弊事件

由于武学生和太学生往来密切,后者往往出于“朋友情谊”,发挥自己所长替前者参加程文考试,“一篇之论,片时可办,各以余力助其武举朋旧”,甚至“有试卷与引试弓马日书簿字迹绝不类者”^⑨。然而,“一法立,一弊生,禁防已密而奸幸复出”^⑩。武举舞弊固然存在,文举舞弊现象则更为严重。开禧元年,群臣极言文举舞弊,“移易卷案,挟带书册,往往有之。代笔之弊,最其甚者。显行贿赂,略无忌惮,或替名入试,或就院假手”^⑪。甚至当年状元毛自知,自取解到殿试,一路舞弊,“自知本名自得,冒其弟之解,叨预奏名。其父宪时为都司,与苏师旦素厚,经营传出策题,前期策成全篇,宪之笔居多。差为编排,文字可认,优批分数,遂膺首选”^⑫。因个别人舞弊而轻率否定武举所取者的素养与资质,显属以偏概全。

2. 武举成为入仕捷径

宋代武举重程文、轻弓马,以致“弓马近于具文,所取不过解作《七书》义者”^⑬。于是,许多应文举进士者“两处投下文字,失解后旋看兵法,权习弓兵,意务苟进”^⑭,太学生“久不第者,多去从武举”^⑮。姚勉认为,“此天下之士所以指右科为速化而竞以趋之也”^⑯。然而,文举也好,武举也罢,都不过是一种选官手段。只要能选拔到人才,就不能视作失败。况且,武举绝非一试即中的捷径。如杨巨源“应进士不中,武举又不中”^⑰;陈师稷“善词赋,尝试进士举,不售。去,试武举,绝伦,又不售”^⑱;等等。若他们能改由武举入仕,其

① 王之道《故武节大夫陈文叟墓志》,《全宋文》第185册,第132页。

② 陈傅良《跋徐荐伯诗集》,《全宋文》第268册,第2页。

③ 周密《齐东野语》卷12《姜尧章自叙》,第212页。

④ 刘宰《故马帅周防御圻志》,《全宋文》第300册,第326页。

⑤ 吴自牧《梦粱录》卷15《学校》,第132页。

⑥ 程俱《故武功大夫昭州团练使骁骑尉徐公行状》,《全宋文》第155册,第375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303页。

⑧ 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第3686页。

⑨ 《宋会要辑稿》,第5614、5615页。

⑩ 《宋会要辑稿》,第5373页。

⑪ 《宋会要辑稿》,第5356页。

⑫ 《宋会要辑稿》,第5419页。

⑬ 《刘克庄集笺校》卷81《欧阳经世进〈中兴兵要〉申省状》,第3612页。

⑭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367页。

⑮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武举》,第1001页。

⑯ 姚勉《廷对策》,《全宋文》第351册,第337页。

⑰ 脱脱等《宋史》卷402《杨巨源传》,第12194页。

⑱ 戴表元《戴表元集·剡源集》卷16《陈府君功父墓志铭》,陆晓冬等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34页。

知识储备、文字水平都有基本的保障。

至于武举进士再应文举进士科,从而试换文资,一度以“今既由武艺入官,又复慕为文臣,是右科徒为士子假途之资”为由被禁止,又终因“入货、门荫之流犹许换试,而武举进者独可沮抑其所能乎”^①而取消禁令。平心而论,科举只是手段,得人才方为目的。武举进士又中文举,正说明朝廷获得了文武兼备的全才,应该予以肯定。事实上,两举皆中者,往往有极佳的官声和政绩^②。况且,“能中两科者,不过挺特翘楚之辈,岂能一舍武就文乎?”^③极少数特优者能中两举,并不妨碍武举选拔军事人才的存在价值。

五 结论

宋代士大夫作为政治主导力量,广泛参与军事决策,甚至统兵作战、镇守一方。为选拔符合士人价值观的理想将帅、改造武将群体,更全面深入介入军事议题,他们积极谋划复开武举,并以文举进士科为模板,全面重塑武举。宋代武举取士定位为“博延方略之士,参阅材技之能”^④,因此加重了军事策论的分量,增加了兵书大义的考查,确立了首重程文、次及弓马的选拔标准,以此选拔“方略智勇之士”^⑤;后又仿照太学,创立武学,以武经七书为主要教学内容,注重儒家思想的教化熏陶。

士大夫视武举进士为“儒而谈兵者”^⑥、武学生为“士之有武勇者”^⑦,将其引为同类。面对职业军人对武举从军人的排挤打压,士大夫联名抗议、及时干预,保障武举进士升迁资格与政治权利,且“申飭三衙、沿江军帅待以士礼”^⑧。对于武学生发起的各项运动,士大夫和太学生给予有力支持,使每场运动都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武举作为武官入仕的正途,确实选拔出一批合格的军事、行政人才。他们在战争岁月守卫疆土、屡建功勋,壮烈殉国者亦不乏其人;在和平年代,或担任统兵官、治安官,维持一方治安,或出任边地亲民官,有效应对各类武装挑战。武举出身者的行政风格,与文官士大夫相近,兴学校、敦教化、奖拔寒士、劝课农桑;其兴趣爱好,与文官士大夫一致,喜好诗词书画,称引儒家经籍。在彼此认同下,武举进士、武学生在重大政治议题上与文官始终保持一致。

诚然,武举所取者未必都是优秀武官,但文举所取又岂能尽为杰出文臣?后人多批评宋代武举过分关注兵书,认为纸上谈兵非选拔将帅之道,然而“有将才者,必习兵法。习兵法者,不必有将才”^⑨,精熟兵法不是万能的,但为将者不通兵法则万万不可的。正如苏轼所言,“今夫孙、吴之书,其读之者,未必能战也”,然“以为未必然而弃之,则是其必然者,终不可得而见也”^⑩。武举所选未必都是将才,但若停废武举,则军事人才必然少一入仕正途。作为士人中的特殊一类,武举进士对宋政权高度认同,入《宋史·忠义传》者五人,入《奸臣传》、《叛臣传》者则不见一人。在建炎颠沛迁转中,武举进士始终坚定站在赵构阵营一边,“宋南渡后,士由右科进者,率先从戎,隶三衙而次京口”^⑪,竭力重建宋政权。显而易见,宋代士大夫以重塑武举改造武将群体、参与军事议题的实践,基本取得了预期成效,武举所取之士“岂得谓之无益于世者”^⑫?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宋会要辑稿》,第5614页。

②周兴涛、董克宁《宋代科举中的文武举互换现象》,《文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47页。

③《宋会要辑稿》,第5614页。

④胡宿《御试武举策题》,《全宋文》第22册,第18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500页。

⑥赵昉《试武举进士制策》,《全宋文》第234册,第375页。

⑦袁燮《武学登科题名记》,《全宋文》第281册,第248页。

⑧王林《燕翼诒谋录》卷5,第45页。

⑨《李觏集》卷17《强兵策第十》,第167页。

⑩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卷9《训兵旅·蓄材用》,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621页。

⑪俞希鲁《从军舍人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3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48页。

⑫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29,第609页。